

“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

杨胜刚

摘 要：农村作为当下社会问题呈现的终端场域，伴随时代的剧烈转型，已成为各方力量、阶层关注的显性问题和诸多学者、作家关注和叙述的重要对象。近两年来，伴随新媒体的巨大传播力，“返乡体”的出现成为叙述乡村的重要力量。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单纯是传播事件，也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隐含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它带着问题的尖锐性和话题性，多了一份直面问题的粗粝特征，从多个层面揭开了被遮蔽的农村真相，从精神气质和底层文学上获得了深层沟通，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创作实践廓清了底层写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农村叙述；返乡体；底层文学；新媒体

农村作为当下社会问题呈现的终端场域，伴随时代的剧烈转型，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各方力量、阶层关注的显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以“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为题，“特地组织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和城市规划设计等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着手，多视角地分析中国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乡村”^①。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近几年的乡村叙述中，除了以上学理化的表述外，一种借助新媒体的叙述体，披着返乡笔记的标签，在媒体的话语喧嚣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并呈现了一批典型文本。以与笔者相关的2016年广为传播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例，从叙述对象而言，基本以亲历的经验为准，“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②。从叙述主体而言，基本是农村出身、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具有一定话语权和表述能力的知识分子。换言之，这种被媒体表述为“返乡体”的新的表达形式，无论是表述对象、表述主体，还是两者所构建的知识生产关系，在和现实建构关联时，都呈现了诸多需要从学理层面加以梳理的要素。本文将结合“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这个话题，从“底层视角下的乡村叙述”和“叙述主体带来的叙述动力”两个层面，在审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基础上，对“‘返乡体’视角下的乡村叙述”这一话题进行学理化梳理。

一、“返乡体”直面农村现实

十几年来，伴随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对农村的叙述成为不少学者、作家的重要表达对象。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熊培云的《谁人故乡不沦陷》《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等，因为独特的人文学者的眼光和多学科的观照视野，在感性的表达和理性思考层面，都引发了很多人的同感和思考。与此形成呼应的另一种表达“返乡体”，近两年来，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对农村的叙述同样成为热点，并涌现了一批典型文本。如2015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2015年9月王君柏的《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如果说，前者更能体现文本的全景性和系统性，后者则更凸显了问题的尖锐性和话题性，相比前者的学院气息，后者更多了一份草根性和面对问题的粗粝特征。

①《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编者按”，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页。

②参见“当代文化研究网”2016年1月27日发布《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

常培杰说,“就文体而言,返乡体写作与传统农村题材写作的差别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写实性,或者说是乡村生活实录,这与带有较强情感色彩的随笔和虚构特征的小说差别明显,语言通俗易懂,受众面广”^①。尽管“返乡体”从文体特征而言,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从其内在精神来看,却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关注农村、悲悯农民的传统一脉相承。比如,最近的返乡体写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1世纪初兴起的“底层文学”中的农村叙事。关于底层文学,李云雷有过这样的理论描述:“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②“返乡体”写作尽管涉及到多种学科背景,不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存境况的描绘,在书写底层背后所给予的对农民的同情,以及对现实所持的反思和批评态度,都和底层文学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内在的高度契合。事实上,如果将视线稍微拉开,可以发现,在如何叙述乡村方面,当下的“返乡体”写作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有很大的相通性。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大都年青,没有多少白话文学的准备,在叙述农村的时候,直面现实的冲动胜过审美创造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写作近乎记录,直接地无所修饰地进入了农民日常生存的状态之中,能纪实性地再现在极端的贫困、深重的压迫下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境遇。而纪实性的“返乡体”写作也正是因为“太真实”而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它和左翼文学在表达现实的直接性上非常接近,而二者共同体现出来的写作者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鲜明道义立场,都让它们具有郁勃的感染力量。黑人作家莫里森说:“写作是为了作证。”无论是以陈应松、曹征路、罗伟章等为代表的底层文学对农村的书写,还是以叶紫、洪灵菲、楼建南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描绘,还是当下“返乡体”写作描述的乡村图景,都以“见证”和“记录”方式呈现了农村和农民在不同时代精神与生存的真相,有着与大地贴近、血肉相连的充沛元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两年伴随新媒体传播的“返乡体”,其实延续的正是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的血脉。尤其在面朝农村和农民的书写上,更是如此。只不过,“返乡体”因其非虚构性和冷静的理性,使其所反映的问题(诸如留守儿童、农村养老、环境污染、资本对土地的侵蚀等)更为具体,也更有针对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峻急性。而左翼文学、底层文学因为其文学文本的形象性而在使其传达的内容更为笼统和丰富。

“返乡体”揭开了农村被遮蔽的大量真相,众多学者在“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专题中,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农村问题的复杂,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如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剧,农村孩子上升通道狭窄,养老、留守儿童、环境污染等重要问题。在“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专题中,蒋慈英提到,“农村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不足、生活照料缺乏、精神慰藉欠缺,存在着养老的‘不充分在场’以及养老照顾的缺位、无能和无为”^③。段成荣以数据凸显留守儿童问题之严重,“2010年,全国18岁以下留守儿童数量达6973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高达6103万人,比2005年增加242万人,增长4.1%。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占54.08%,女孩占45.92%”^④。王君柏则理性客观地描述了农村问题在时空维度上的坐标,“从纵向比较,中国农村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但从横向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所说的乡村衰落问题。究其实质,目前中国乡村的失落只是一个相对衰落的问题,但这种衰落,却存在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趋势”^⑤。很明显,面对农村危机的种种症候,它背后有更为深刻的与价值观念相关的东西。以张玉林教授的《农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一文为例,尽管作者从经济学和法理学的角度,认为污染主体多,形成了一种“共犯关系”,其实,除了这种理性考察,还有更重

① 常培杰:《反对浪漫化的乡村叙事》,载《十月》公众号2016年4月12日,“文学与乡村的对话”发言摘编(一)。

② 李云雷:《“底层文学”是个什么玩意?》,载天涯社区“散文天下”,2008年1月17日。

③ 慈勤英:《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3页。

④ 段成荣:《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在于止住源头》,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5页。

⑤ 王君柏:《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35页。

要的原因,就是城市价值观念单一化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农村原本具有的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敬天惜物的情怀被方便、快捷的消费文化损失殆尽。如果不从价值观念方面正本清源,农村分散化的居住环境和集约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必然产生无可调和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加剧农村的污染问题。今天,在广大的乡村,问题的呈现不再以单一的面相出现,而是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特征,病象深重,学者从不同层面呈现真相,敞开真实的世界,具有现实意义。“我去年觉得这类以描述为主的笔记体文章比粗浅的批判文章要有价值,因为当时的状况而言,呈现问题比不知所云的高调批判要有价值。”^①无论是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还是王君柏的《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都客观上达到了叙述真相的目的。正如何志雄在《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返乡?》中提出的,“如此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应有足够的理由来严肃地对待返乡这个话题。博士返乡笔记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论和关注,本就说明了返乡这个话题的重要现实意义。但不能像很多人那样盲目乐观,把对乡土社会的担忧看作杞人忧天”^②。“博士的乡愁,绝非无中生有,也说明,即使是博士,也在进城中遭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和矛盾。笔者认为,当下社会热烈讨论返乡,就应该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可持续生存的高度来看待返乡的可能性”^③。更有学者理性探讨,将农村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城市联系起来观照,指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农村有种种问题,但大部分问题是‘要劳动力不要新市民’的畸形城市化造成的,绝不是‘乡愁’式的故乡批判可以解决。解决农村问题的钥匙在城市,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也在城市”^④。概而言之,“返乡体”在现代传媒语境下,其热传尽管有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但客观上还是呈现了农村的真相,引起了大家对农村问题的持续关注。

二、“返乡体”叙说者的资格考量

下面,回到“返乡体”叙述主体上来。以王磊光、王君柏、黄灯三位作者为例,他们都曾获得博士学位或者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受教育程度高;从出身而言,他们都来自农村,对农村生活有着直接的感触,这注定他们对农村的叙述离不开血肉相连的乡村经验;加上学术训练,叙述中也会天然带有更多理性分析,从而避免了情感的泛滥。笔者想追问的是,他们作为农村经验的亲历者和具有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这双重身份的纠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获取叙述乡村的合法性?换言之,“返乡体”在底层视角的烛照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破解学术界关于底层文学代言人的困境?李云雷在《“底层文学”是个什么玩意?》一文中曾提到,很多学者诸如蔡翔、王晓明、孟繁华、刘继明、南帆等,“一直在讨论什么是底层文学,底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了,可能别人就说你跟底层人关系不大,就一直在讨论理论层面这些问题”^⑤。这种理论层面的担忧涉及到两方面,其一,在他们的视野中,知识分子还具有精英气质,在社会分层中,他们依然不属于社会底层,因此,存在一个是否具有代言资格的问题;其二,建立在对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判断上,他们担心这种带有“启蒙优越感”的书写和真实的底层生活存在隔膜,或者说,他们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就算代言资格能够获得,他们代言的质地是否能保证真正的底层气味?很明显,这种担忧因为建立在理论的想象和概念的推演层次,很难在学术争论上获得基本共识,以致因为争论不休,对“底层文学”这个概念都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返乡体”的出现,从创作实践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其一,“返乡体”之所以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触发普通人参与讨论的热情,恰恰来源于创作主体代言的真切性。换言之,在以往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底层和知识分子关系,对“返乡体”而言,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叙述主体大都出生在底层社会,依然和故乡、亲人有着血肉关联,这种代言没有任何超越具体情境的优越感,在叙述中都带上了自身体验的深沉痛感,以叙述个人体验的方式

①常培杰:《反对浪漫化的乡村叙事》。

②何志雄:《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返乡?》,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5期,第26页。

③何志雄:《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返乡?》,第27页。

④西坡:《解决农村问题的钥匙在城市》,载《决策探索月刊》2016年第2期(下),第9页。

⑤李云雷:《“底层文学”是个什么玩意?》。

触及到了社会痛的神经。其二,“返乡体”的出现,也以真实的生存场景叙述凸显了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中的真实处境。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例,从传播途径和效果看,它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①,而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正来源于文字本身的真实,这一点,从“网易新闻”网友的评价中可以获得证实。在笔者浏览网友的意见时,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我哭了!我大概是最后一批通过知识逃离农村的一员”;“我就是农民,我承认我们农民就是最最最下等的人”;“真实的写照,最近几年工程款拖欠的越来越多,村里好多同龄人都拿不到应得的工资”;“犹如在剖析我个人的内心一样,真实的农村就是如此,对于养尊处优的城里人来讲他们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感同身受,对于我们这种被称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回农村是不可能的,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想要真正融入进去是有多么的难。即便拿着高级白领的年薪,可内心深处仍然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写的太好了,真是农村的现实,有的地方比这还要苦。生活脆弱到一碰就碎。社会的不良触角,政府人员的不作为,不用手中的权力去解救百姓的苦难而是去谋私”;“来自江汉平原的我看得泪崩了,写得很深入,很真实!”但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若不是笔者在具体的生存中面临和处理了无数的生存难题,直接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奈和痛楚,也难以有如此真实的表达,这实际上暗示了农村出生的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进入城市,但其进入城市的具体过程蕴含了很多真实的痛楚,只不过很多当事人没有写出,但“返乡体”的作者,能够直面现实,将内心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从这个层面而言,“返乡体”的创作主体,在学院知识分子怎样与现实产生有效的关联和对接上,实际上已经通过文字的表达在一步步推进了。

三、结 论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精英阶层,经过城市生活的熏染以后,在节假日重新回到故地,在城乡生活经验差异的烛照下,这种对农村本相的书写,折射了知识分子介入和表达现实的可能。在现有语境中,尤其是在新媒体传播的语境下,“返乡体”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传播事件,也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隐含了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全新课题。事实上,“返乡体”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在巨量的传播和阅读中所产生的能量和干预效果,已经远远大于传统的新闻媒体,甚至其本身就成为传统新闻媒体运作的由头和取材的起因^②,在此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追问,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可能及空间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毕竟,当下学术环境理论的过度演绎所显示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学术对现实的介入能力越来越呈现出边际的递减效应,这显示了知识生产的一种深刻危机。而如何考察和应对这种危机,“返乡体”的出现,以创作的实践,站在学院知识分子的角度,通过对农村的审视、表达,直观呈现了破解这种危机的一种路径。至于其后续所能达到的效果,只能留待以后的观察。

●作者地址:杨胜刚,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Email:zhongda211@163.com。

①“当代文化研究网”公众号2016年1月27日推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后,一天之内,阅读量过十万,达到微信统计的最高数;网易新闻2016年1月29日转发后,跟帖有23000多条;《人民日报》公众号2016年2月1日转发后,阅读量很快过十万。还有诸多公众号转载也获得广泛传播,如“于建嵘的东书房”转载号,阅读量也接近十万。百度搜索《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网页数是552000。尽管微信公号阅读量过十万以后就没有统计,很难通过阅读量统计具体的阅读数,但根据以上数据和媒体综合反映情况综合判断,阅读量非常大。尤其是在2016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家在丰三村”后,媒体对此文的关注第二次发酵。

②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例,春节期间,笔者回到家乡过年,暗中观察了村里农民对此文的反应。原以为50岁以后的农民,因为智能手机运用并不普遍,对此可能会不知情,但是在年轻人的传播下,居然全村人都知道此事。而且根据部分内容揣测写作动机,并涉及对农村具体政策的评价。随后,在某电台做节目的过程中,当地官员极为谨慎,充分显示了文本所承担的传统新闻对社会的干预效果,而其在现实中对当地基层组织的触动,也是前所未有的。